

2501 73
石家文史

资料第二辑



昆明地区文联、昆明地区作协编

目 录

- (1) 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对云南部队和 赵从云
云南起义的指导
- (23) 昆明学生在反美扶日运动中包围美 康 坚
国驻昆领事馆的经过
- (28) 解放初的云南大学花灯剧团 李家祐
- (30) 《永昌祥》和严子珍 蔚霁虹
- (35) 福照街的“开化三七庄” 戚秋圃
- (39) 云南特产名贵药材开化三七简介 萧光汉
- (45) 解放前的昆明典当业 张 谅
- (51) 昆明的四季菜肴 天 麟
- (52) 商品票证史话 何炳荣
- (58) 北门街头说“浩劫” 万揆一
- (73) 轰动昆明的卢宅被劫案始末 马恩亮口述
寸适矩整理
- (80) 从城隍庙到劝业场 张 谅
- (83) 南城外公园沧桑史 石 阡

(100)	“文化区”里的茶馆和小吃	吴 棠
(104)	昆明《绘芳阁》百年记	张季孟
(107)	回忆《诗播种》丛刊	苗 沙
(110)	记赵藩的得意门生——何小泉	张 谅
(113)	昆明四大名花	秦瑞康
(118)	纳霞屏上的摩崖题刻	耕 禾
(122)	宫、碑、庙	张科仁
(124)	圆通山上的唐继尧墓	张科仁
(126)	五华区政协简况	区政协办公室
(132)	五华区原管农村乡的情况	区志办公室
(134)	编者的话	
	(补白) 史志资料四则	区志办公室

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对 云南部队和云南起义的指导

为纪念云南起义四十周年而作

赵 从 云

云南和平起义已经四十周年了，直到现在还有人 说，云南起义是大势所逼，形势所趋，迫于万不得已的自谋政治出路。

按照这种说法，孙渡和鲁道源所率领的 五十八军，同样是龙云所领导的嫡系部队，同样中共中央派有专人对他们进行策反工作。淮海战役以后，他们由河南退到湖北，由湖北退到湖南，最后又退到桂西滇越边境，已经靠近云南大门，接近富宁、广南家乡，按理就应当转回云南，配合卢汉行动，截断李弥、余程万逃到东南亚再转回台湾的反抗企图，借此机会立下起义首功。但鲁道源没有这样做，结果在没有逃出国境以前，就被我四野解放大军彻底击灭，鲁道源本人只身逃到海南岛再转台湾，这又怎么解释呢？

云南“龙卢政权”在 1937 年以前，基本上是靠拢蒋介石的，虽有矛盾但不显著。在 1938 年 10 月武汉会战以后，由

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化，斗争情况复杂，蒋介石把他的统治权力逐步由中原地区向西南转移。这种情况触动了云南地方的封建权利，使蒋、龙矛盾逐渐加剧，最后导致龙云下台。

我党中央在抗战开始初期，就估计到蒋、龙之间，在某个阶段，在形势演变中，会产生内外配合，主次协调，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某些趋势，因而制定了对云南地方政权采取尽量争取，又联合又指导的方针。现在我根据三亲史实，逐一概述如下：

（一）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对龙云的统战关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抗战会议，电召龙云到南京参加。龙云应召，包一架欧亚航空公司专机，经西安加油转飞南京。当时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等在机场迎候；龙云下机后，蒋、何告诉龙云，延安客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亦要到南京参加抗战会议，在西安候机，并征求龙云意见，可不可以顺便搭乘龙的包机。龙云当即表示热诚欢迎。周恩来系初次和龙云见面，朱德、叶剑英和龙云，既是同学又是旧友。他们三人化敌为友，久别重逢，因而谈笑风生，言论自若，气氛极为融洽。

龙云到南京后，蒋介石把他安置在北极阁宋子文寓所，笔者当时曾在南京。接着日机开始轰炸南京，蒋介石考虑到龙云的安全，要龙云暂时迁到汤山。龙到汤山后，第二天又邀请周、朱、叶三人到汤山会晤，座谈时局。周恩来因有要事亟待处理，没有赴约，朱、叶二人应邀前往，三人座谈抗战大计，意多吻合，最后谈到双方以后的联络问题，龙云表示：“我的秘书搞编造密码工作，远远不如共产党，如何制定

密码，请由二位全权负责，我遵照办。”从此以后，昆明和延安就建立起秘密联系。据说电台是设在龙云公馆，密码由龙云的私人秘书保存。

龙云回昆后，中共中央又派华岗教授到西南联大工作，以教书为掩护，和龙云建立起经常联系。抗战中期，前进与倒退，抗战与和谈，正反两种意见冲击着抗战舆论。华岗教授又到雅安、成都，分别走访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以及川陕边防总司令潘文华等人，为龙云与川滇两省高级军政将领建立广泛联系，也为以后1949年的云南起义能得到刘、邓、潘等人的联合支持，埋下了深远基因。

抗战胜利后云南事变前夕，华岗教授又由重庆回到昆明，当面告诉龙云说蒋介石对和谈无诚意，要龙云提高警惕，可惜龙云没有把金玉良言铭记在心。

龙云下台后，由重庆迁到南京，中共中央曾千方百计派上海负责人吴克坚秘密和龙云取得联系。

和谈破裂后，周恩来离开南京回延安前，曾利用黑夜去看望龙云，其关注之情可以想见。此事第二天就被特务侦知，向蒋反映，蒋介石曾质问龙云，追查此事。

（二）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对卢汉的统战关系

龙云回滇后，把在南京汤山同中共领导人商谈联合抗战的情况告诉卢汉，并要卢汉在以后出发抗战时，要多加注意，尽量同中共保持联系。

1937年10月5日，六十军在巫家坝誓师出发抗战。1938年元月，部队到达武汉附近整训。中国共产党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当即以各种救亡团体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名义用慰问队、歌咏队、演唱团等形式，开始和六十军的中上层干部

和广大士兵接触。1938年春，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通知卢汉，罗炳辉将军将以云南同乡名义到武昌熊廷弼路六十军后方办事处拜会卢汉将军，卢汉欣然谒见。随后卢汉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回拜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罗炳辉等中共领导同志，并转达了龙云对他们的致意。

过了几天罗炳辉将军又以云南同乡名义到武胜关、鸡公山，拜会一八四师张冲师长（当时六十军三个师分驻平汉线上的信阳、武胜关和花园三处），由于张冲师长因病驻汉口医院，罗、张二人没有见面。张冲得知情况后，又请中共地下党员张永和、黄洛锋两同志介绍，亲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拜见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罗炳辉。见面后张冲当面向中共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他本人要求加入共产党，二是他要求我党派干部到他的部队工作。当时中共答应了他的第二个要求，派薛子正、张天虚、周时英三人到该师工作，薛任师作战参谋，张在师政治部工作，主编抗战军人刊物，周时英任支部书记。张冲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避免外部干扰，自兼该师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新吸收了一批共产党员，扩大党在滇军部队的社会基础，为尔后1946年5月18日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种下了先远基因。

与此同时，六十军在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等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又吸收了一批武汉青年，有蒋南生等二、三十人，组成文艺工作队，如歌咏团、合唱队、话剧团、电影放映队等，到六十军各师开展抗敌救亡工作。他们出黑板报、画漫画，大唱革命歌曲，特别在一八四师搞得更加新鲜出色。此事被国民党派在六十军任副官处长的特务骨干邱开基知道后，拍下照片向蒋介石告密，蒋介石大为恼怒，立即召见卢汉追查。蒋介石当面声色俱厉地责问卢汉：“你的政治

中心是什么？”卢汉答不出来。接着蒋又问：“听说共产党派人在你部队内搞活动，是真的吗？你还满无所谓。”又说：“他们会拉跑你的部队，你知不知道，这很危险。”卢汉回答说：“我是军人，只知道服从统帅，服从委员长指挥，别的我不在意。”蒋介石听了以后，认为满意，怒气稍解，并告诫卢汉说：“以后要多加注意。”卢汉回到军部后和张冲密议决定，以后和共产党人接触，要采取隐蔽方式，不要再给特务们抓到把柄。”

最受六十军全体官兵热烈欢迎的是“六十军军歌”。此歌是冼星海作词，云南同乡聂耳谱曲，每当六十军官兵在极度疲劳困苦之时，高歌一曲，士气为之振奋。

1938年四五月间，台儿庄大战爆发，六十军被调到台儿庄参战。4月20日以后，台儿庄大战第二阶段开始，24日夜蒋介石同白崇禧亲到台儿庄附近的车辐山车站督战。周恩来以大本营政治部副部长和中共代表的双重身份，到五战区长官部同李宗仁、白崇禧等共开作战会议。会议决定：于学忠兵团向东，汤恩伯兵团向西，六十军顶住正面，向北反攻，三个兵团协调行动封锁袋口。八路军游击队负责破坏敌后交通，阻止敌人增援部队，特别注意提供敌人后方调动情况，共同围歼侵入邢家楼、五圣堂、蒲汪、辛庄一带的日寇主力矶谷、板垣两个师团的大部。

青年作家共产党员张天虚，早年同聂耳从事学生运动，聂耳不幸死于日本，张负聂耳骨灰回国。六十军到武汉期间，由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一八四师工作，代名为张剑平。在台儿庄血战中，他经常出入前线进行战地采访，他才思敏捷，文笔锋利，写过《运河血流》史诗般的文章和《冲过单城集》”的豪迈叙文。一八四师在禹王山血战期间，他和张

冲师长谈天说地，锋芒所及，直砭抗战时弊。台儿庄会战末期，党中央又派张子斋到一八四师工作，充任张冲秘书。

5月14日前后，日寇南北两路夹击六十军，战斗空前激烈，大公报记者、新华社记者、华北日报记者经常到六十军战地采访。黄河合唱团队长张××、新华社记者刘××先后告诉我说：“危险的时候，你可到村子里去找‘红枪会’会员，你说明是六十军的人，他们会帮助你的。”我问“红枪会”是什么组织，是不是“红灯教”流派，他们说“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是反对洋人、反对鬼子，坚决抗战的。

5月18日，我军开始从徐州外围撤退，当时日寇已四面包围徐州，社会混乱达到顶点。当时卢汉给我两个任务：一是保卫军长安全，二是保管好全军官兵生活经费国币20余万元。此事关系重大，我不得已到村子里去找“红枪会”会员，请他们帮忙，替我找向导带路突围，约定每天给领路费200元，每24小时轮换1人，如何找人替换，由他们去办。20日深夜，部队到达津浦路南段夹沟车站附近，军部副官处长刘达夫找不到带路向导，被卢汉责骂。当时形势紧急，日军炮火已射击到部队中，我不得已将向导交给军长带走，我又另去村里再找“红枪会”会员。他们究竟是不是八路军游击队员？直到现在对我还是一个谜。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怕死，为什么不逃走？”他们回答说：“大家都走了，不要家乡，对不起老祖宗。”我听了以后感到又惭愧又佩服。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只要说明我们是六十军的人，他们就会帮忙，是不是周恩来同志对他们打过招呼，此中情况也令人深思。

5月下旬，部队到达武汉附近补训，军部驻黄陂。有一天，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派人送来朱总司令致六十军的慰问

信，信面写明面交卢汉先生亲收，信中大意是说：贵军台儿庄一役，战绩辉煌，人心振奋，敌寇胆寒，实堪钦佩。抗战形势，艰险复杂，切盼贵军审慎择处，善自珍全。这后一段话，把李宗仁、蒋介石要我军打后卫、打游击，掩护他两个嫡系部队撤退的狡诈阴谋揭露无遗。语意双关，令人敬佩。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接着又是第一次长沙会战，六十军以赫赫威名，震动敌国；卢汉以战功卓著，荣升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张冲以能征善战，提拔为新三军军长。在保卫武汉和长沙第一次会战期间，张冲愤恨蒋介石牺牲杂牌部队，保存嫡系实力，把部队拉上赣北幕阜山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愿在敌后打游击，真正抗日。”蒋介石派人把电报送给龙云，龙云大为恼怒，说：“他要真正抗日，难道我云南出了十多万大军是假抗日。”再加上五十八军在通山、崇阳惨败，又嫁祸于张冲，密告张冲“私通共产党，延误战机”。龙云在盛怒之下，把张冲调回云南，撤去军、师长之职务。当此之时，中共中央力劝张冲顾全大局，回云南说明情况。张冲调回云南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便于在滇军中开展地下工作，又重新调整部署，把薛子正调回南岳游击干训班，把周时英、刘梦田调回新四军，把张天虚和蒋南生调回云南。后来张天虚在云南处境困难，又到缅甸主办《人民侨报》，独力编撰，积劳成疾，1943年在昆明逝世，葬在西山聂耳墓侧。一代英俊，没有看到新中国的革命成功，没有见到云南人民的解放胜利，真是党和云南人民的不幸。

中共中央南方局把薛、周、刘、张、蒋等调离六十军和一八四师后。另建工作组，派张永和、杨彬（原名杨重）、刘孟田、张士明、宁坚、杨永新等人到一八四师工作。

1940年10月，日寇侵占越南，滇越边区形势紧张。龙云

电求蒋介石把六十军调回云南，驻防蒙自屏边一带，沿红河北岸防御日寇。卢汉在滇重组第一集团军总部，辖第一、二两路军，张冲由于得到卢汉的竭力保荐，又担任第二路军指挥官。张冲为了缓和龙云对他的疑虑情绪，只负名而不到职。但在暗地里却又把原来在一八四师工作的中共党员，调一部份到第二路军指挥部工作。对此卢汉不闻不问。

抗战胜利后，滇军入越受降，改编成六十、九三两军，第一、二两路军指挥部撤消，张冲回昆进行国大代表竞选，在政治上又和蒋介石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国大代表选举完毕，张冲借口到北平游览，进入解放区，然后转赴东北，开始对滇军进行面对面的策反工作。

（三）中共中央对六十、九三两军开到东北后的策反工作

1945年10月3日拂晓，云南事变，10月4日，杜聿明、何应钦、宋子文等挟持龙云飞赴重庆。与此同时，蒋介石一方面发表卢汉为云南省主席，一方面又成立云南警备总司令部，钳制龙云部队。卢汉把全部滇军改编成六十、九三两军，以曾泽生为六十军军长，以卢浚泉为九三军军长。当时蒋介石与卢汉的交换条件是：“一、两军开到东北参加反共战争，卢汉回滇继主滇政；二、卢汉亲率两军到东北，负责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职务，云南主席另行派人接替。”在这种情势下，卢汉权衡轻重，只有顺从蒋介石交出个人实权，回滇主持省政，然后利用自己在云南的历史优势，隐忍求全，徐图转换。当时在云南的一批民主人士和某些联大教授，由于各种关系，私下向卢汉建议，要卢汉采取“前方掩护后

方，后方支援前方”的策略，因应时局，徐图后举。卢汉采纳了朋友们的好心建议。

1946年春，驻在越南的宪兵第五团，在河内拘禁中共党员朱家璧，并电卢汉解赴重庆。卢汉表面上持缄默态度，另由卢浚泉出面，致电重庆军委会要求保释，原电说：“……朱家璧自到我部无异动，职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免解重庆。”于此可见，二卢在内战开始初期，早就为云南人民的解放事业，预伏基因。

1946年夏，两军开到东北参加反共战争，由于蒋介石、杜聿明对滇军采用分割使用，划地坚守的毒辣阴谋，企图利用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削弱卢汉的私人实力，以便钳制卢汉，利用滇军。这种情况，激起两军官兵的强烈不满。一八四师当时被分割在鞍山、海城和营口三个点上，在共产党员、该师参谋长马逸飞同志的劝导下，5月底潘朔端被迫在海城起义。这一反掌，动摇了蒋介石在东北的军事措施，蒋介石感到事态严重，忙令卢汉到东北慰劳滇军，企图挽回军心，再为其反共效力。

中共中央洞察到抗战以来，一贯对滇军所采取的艰苦细致地策反工作，已经初见成效，1947年4月，党中央决定派刘浩和禄时英（刘的爱人）两同志，到东北六十、九三两军，做深入扎实地策反工作。当时朱德同志对刘浩说：“前两年我们同云南地方实力派还有统战关系，滇军有些高级将领是知道的。对滇军的策反工作应从三方面着手，即：一、依靠我党在滇军中的地下组织从滇军内部工作；二、依靠我军威力和党的正确政策，不断在前方开展对滇军的政治工作；三、利用各种可能直接与滇军的高级将领接触，公开对他们进行策反。”最后又对刘浩说：“你需要哪些干部，开

出名单交组织部去办。”刘浩当时提出，要刘惠之、苏民、徐克、左仲平、李竞、司维等10余个同志到滇军工作，朱德同志和刘少奇同志表示同意。

根据以上决定，另由叶剑英、李克农两位领导主持，将朱总司令致两军个别高级将领的亲笔私函，交由刘浩转交卢浚泉（九三军军长）、曾泽生（六十军军长）和陇耀（六十军二十一师师长、卢汉表弟）等三人。我当时在陇耀师任参谋长，亲见亲历，至今犹历历在目。接着叶剑英同志又将中共地下组织在滇军内部工作的全部党员名单交给刘浩，其中有杨重（后改名杨彬）、宁坚、王立中、杨守沫、黄政平等。并要他们以后同中共南方局联系。从此以后，有关云南起义的大部份工作，都是一直和中共南方局密取联系，由叶剑英、李克农直接领导进行工作。

刘浩到东北后，根据滇军当时在东北的具体情况，采取八项措施。即：（一）有条件的地下党员尽量争取在滇军部队中掌握兵权。（二）继续在滇军中、下级干部中培养和发展的党员。（三）利用滇军不满情绪进行搭桥工作。（四）广交朋友团结进步官兵。（五）配合我军需要，注意搜集情报。（六）同解放区上级组织建立交通联系，开展内外配合工作。（七）把在滇军部队的地下党组织，分成两个独立单位，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扩大工作领域。（八）六十军方面由杨重、孙公达负责，九三军方面由张士明、杨守沫负责。此后在六十军的中共党员有陆飞、赵雄、范啸谷、赵国璋、余光、詹羽、朱光云等，在九三军的中共党员有李慕春、马翔等。对九三军的策反工作，在冀热辽方面，由陈少中、方正负责。对六十军的策反工作，在吉林方面，由陈方负责。两方面统筹规划，仍由刘浩同志总揽其成。

1948年春，东北解放军对困守吉林的六十军，采取军事包围、政治反攻、经济封锁等三大策略，迫使六十军由吉林撤退到长春。由于撤退工作紧迫急促，致使该军不得不遗弃眷属百余人留困吉林，其中包括原六十军副参谋长李佐（曾任成都军区后勤司令员）的夫人，二十一师第一团长的夫人，还有六十军五十二师师长李嵩的弟弟等。这些人通过中共党员方正、李竞、司维等把他们收容起来，经过学习，由杨彬（即杨重，中共党员原一八四师营长，因受张冲影响，暂时解除职务，解放后任福建军区副司令员）负责，通过和李佐密谈，中共东北局礼送六十军遗留眷属全部回到长春，进一步用实际事实促进曾泽生和陇耀等起义。与此同时，另以中共中央东北局联络部名义，以私函形式，交给李佐夫人转交曾、陇两人，劝导他们当机立断。再一方面，刘浩和陈方两同志又到长春外围前沿阵地，秘密和曾、陇二人商谈起义工作。1948年10月8日，六十军通电全国，正式在长春起义，至此北满完全解放。这是中共中央十年以来对六十军进行深入细致长期争取的丰功硕果。为蒋介石行将灭亡，吹响了一曲哀歌。

（四）为什么长春起义锦州硬打

六十军长春起义后，张冲以个人私交关系，刘浩、陈方以东北局联络部名义，共同致函锦州卢浚泉军长，劝他认清形势，从早决策。当时卢浚泉以九三军军长兼第六兵团司令，驻守锦州，联系关内外战略要地，国共双方都视为棋盘要着。在这之前，刘浩曾多次派员致函卢浚泉劝其早日起义，卢浚泉曾明白告诉刘浩：“对卢主席在云南影响不利。”此中文章和政治奥妙，当时中共方面似未深入研究。

1947年10月，当东北形势急转直下之时，蒋介石要卢汉第二次到东北慰劳滇军，当时两军高级将领曾在吉林秘密召开“应变会议”到会的有卢浚泉、曾泽生、陇耀（二十一师师长）、白肇学（一八二师师长）和我五人，我建议卢汉采用“三环连用”策略。所谓三环是指长春为一环，锦州为一环，云南为一环，一环影响一环，应当视作整体看待，然后分别加以运用。1946年夏初，当两军开到东北从事反共战争初期，云南各界好心朋友和某些民主人士，曾建议卢汉采用“前方掩护后方，后方支援前方”的策略，因应变化。此种策略，在前方战事打得好时，可以起掩护后方的作用，反过来在前方战事打得不好时，又可以起加速变坏的作用。这中间如何保持卢汉在云南的职权地位，是当时决策中关键又关键的要害问题。怎样运用三环？就是长春可以首先起义，用第一环先靠拢共产党，以掩护九三军在锦州硬打遭受沉重牺牲的惨败后果，收拾九三军悲惨结局。用锦州硬打遭到惨败牺牲的痛苦结果，骗取蒋介石对卢汉的暂时信任，保持卢汉在云南的职权地位，准备尔后云南起义。用局部牺牲保住云南整体，为尔后两军官兵谋求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最佳出路。如果蒋介石追究长春起义的责任，卢汉可以说曾泽生姓曾不姓卢，不是我的忠实部下；如果锦州起义，被蒋介石追查责任，“你的么叔为什么不听招呼？”卢汉则无辞可推。这就是长春起义锦州硬打的真实原因。同是卢汉的两支嫡系部队，一支起义，一支硬打，外界人不明真相。有的说曾泽生比较开明，有的说卢浚泉比较顽固，实际上是卢浚泉含冤莫白忍辱负重，为奠定云南起义打下基础，

云南起义后，卢汉曾多次向中共中央反映个中情况，因而卢浚泉，才得到提早特赦，才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五）中共中央对云南起义的策反工作

1945年10月云南事变后，卢汉在云南的地位和矛盾，同龙云原来在云南时候极其相似，蒋介石对卢汉的排挤和压制，经常使卢汉提心吊胆，如成立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直接委马锜为云南省保安司令（按例省保安司令应由省主席兼），如李宗黄不移交省主席职务等等，蒋介石从前对龙云的阴谋手段，现在又重新轮到卢汉头上。这种情况，迫使卢汉逐渐离心，逐渐倾向共产党。蒋介石内战政策的迅速惨败，更加坚定了卢汉自谋出路的信心和勇气。

当1947年10月，卢汉在吉林采纳我的“三环连用”策略之时，决定调我回云南，准备尔后云南起义的工作。卢汉在离开吉林前，当面向我交代，要我在未回到昆明以前，先经由北平、南京、武汉、四川等地，调查蒋介石的反共军事实力。1948年春，我回到昆明，当面向卢汉报告说：“蒋介石已经垮了，我们要自谋出路。”卢汉当面指示，要我提出初步意见，供他研究考虑。

1949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三四个月来对六十军起义部队和九三军投降部队的整顿教育之后，进一步摸清了两军官兵的思想情况和云南卢汉的内部实情，又开展对云南起义的第二步策反工作。

为了争取云南早日起义，东北局先后由副政委李富春、政治部主任周恒，通过曾泽生和陇耀，不断派人回滇，携带李、罗二人私函，劝导卢汉积极准备起义，原信要点是，要卢汉派专人经香港转北平，找周总理和朱总司令商谈云南起义工作。另一方面曾泽生和陇耀又不断以私情公谊，反映中共中央优待两军官兵的宽厚态度，建议卢汉及早准备军事实

力，对付蒋介石安在云南的李弥和余程万两颗眼中钉。

与此同时，原九三军被俘干部，经过在哈尔滨解放团的学习教育之后，认清形势，明了政策，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情绪，先后有十六个中级干部释放回滇。在他们临走向卢浚泉告别时，卢浚泉曾以私人关系写信给卢汉，交给赵振华（九三军团长）、安永松（九三军团长）、夏际昌（九三军炮兵营长）等，要他们面交卢汉，劝导卢汉积极准备起义，为云南人民和两军官兵谋求最后出路。他们回到云南后，又重新掌握云南部队的实权，有的当师长、副师长，有的当参谋长，有的当团长。由于他们在哈尔滨解放团受到共产党的礼遇和优待，他们对共产党都有好感，在对待云南起义问题上，都表示一致拥护。这种情况，推动了云南起义工作的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遁开金锁脱笼到香港的龙云先后派刘宗岳和龙四、龙五回昆，携带龙云私函，敦促卢汉早日起义。并说：“迟了就没有价值。”卢汉要求龙云亮出共产党领导人在香港的底牌，龙云则始终不吐真言，只说由他负责联系。在起义时间问题上，卢汉始终不愿冒无准备无把握的危险。另方面龙云又操之过急，唆使龙纯曾和龙奎垣，在昭通、永善提早暴动。卢汉派我率保安第六团，把龙奎垣击溃，赶回永善。并严重警告龙纯曾，在起义时间上，要服从卢汉的统一安排，不得轻举妄动。龙云在香港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说：卢汉在滇“动摇不定。”党中央深明个中情况，既不公开指责龙云，也不拍电报质问卢汉，只是在香港某报上发表评论员文章说：“私怨重于公仇，反蒋甚于亲共。”妙哉高论，一针见血，令卢汉钦佩不已。原来卢汉自从下定决心起义之后，就派有专人常驻香港打听各方面消息，该人把报纸送回云南之